

# 一个记者的

梦

王吉亮

著

郑惠卿

长江文艺出版社



梦

梦

C3

# 一个记者的梦

王吉亮  
郑惠卿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记者的梦/王吉亮 著

Yigejizhedenmeng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8

ISBN7—5354—1335—8

I . —…

II . 王…

III . 中国—当代—小说

IV . I · 1094

一个记者的梦

Yigejizhedenmeng

◎王吉亮 著

责任编辑:王 虹

责任校对:邓 薇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武汉市青联彩印包装装璜印刷厂

开本:850mm × 1168mm 1/32

插页:2 印张:9.125

版次: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35 千字

印数:0001—1000 册

ISBN 7—5354—1335—8 II · 1094

定价:1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 前　　言

这里奉献给读者的，是我在暨南大学新闻学系任教时，在完成教学和科研任务后，利用几乎全部休息时间，不敢怠懈，孜孜不倦地写成的五部中篇小说。

我们知道，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具有美感和教育功能的，前者就是艺术魅力，后者就是作品中所蕴含的思想教育意义，使作品成为人们的良师益友，培养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操。鲁迅说得好：“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进的灯火。”所以，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它敏感地描写社会又转而影响社会，影响人生。

我曾在报社和电台当过新闻记者，原先以报导真实新闻为己任的我国新闻事业，从五十年代末起，报纸上出现了虚假的新闻报导，到了“文革”期间，“四人帮”的“事实要为政治服务”的谬论，更使假新闻不乏其例。

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县的“三干会”，有一位公社党委书记讲了真话，讲到当时农民的困苦情况，很快被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这位党的基层领导干部，受到了不公正的处分；在报社，我也看到有的敢于报导真情实况的记者，也受到错误的处理。

我们提倡说老实话，做老实人，党报记者应该像彭德怀元帅那样，“我为人民鼓与呼”，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事实上我国新闻队伍中的不少记者就是这样做的。在《一个记者的梦》中，我

塑造了海州日报记者耿元政的艺术形象，他因报导真实新闻而蒙受牢狱之灾，但最终得到了党和人民的重用。

一九六〇年前后，我在一个省报工业部当记者，较长时间地采访了煤矿，当时国家缺乏石油、天然气，煤炭就是唯一的动力资源。在掌子面，我看到矿工们为了多采煤、采好煤，出大力流大汗艰苦劳动的情景，看到他们爱惜器材，也听到一心想多挣钱，让自己在旧社会吃了大苦的母亲，能过上好日子的一个青年矿工的故事。在党支部的教育下，师傅们的帮助下，他从一个后进工人成为全矿的劳动模范。这位青年矿工我采访他多次，后来在报上发表了人物通讯《名师高徒》。我和矿工们一起上井下井，看到他们黝黑的脸，也看到他们为国家辛勤劳动的红亮的心。这位青年矿工就是小说《春岭矿奇案》中刘铁子的原型。

在我工作过的单位附近，有一所小学，由于邻近，我认识学校的校长和教师。他们告诉我，学生们是色彩缤纷，性格多样的，有的爱玩爱闹，有的文静用功。有的学生成绩优秀，不爱锻炼，经常闹病；有的学生爱体育运动，体魄健壮，不爱读书，差点留级，我观察、研究了几个典型学生，也很喜欢这些天真活泼的孩子。我不会踢足球，却爱看踢足球，于是从构思组建一个小足球队着手，研究足球运动，研究小学数学课本，在小说《小鸟叫了》中，让红领巾们在共青团员的领导下，通过体育运动和数学教学，在德智体方面全面发展。我塑造了小球星唐晓彤和小数学家柳明文二个典型。

作专业编剧时，我在农村和山区较长时间生活过，生活不免艰苦，但也十分充实。小说《山乡雨声声》，以破获前志愿军连长高龙庆被害的悬案为主线，终于挖出了一个隐藏得很深的坏蛋。年轻的大学生们立志用现代科学来发展山区经济，建设富裕山村，这是描写以茹海瑛为典型人物的九十年代大学毕业生风采的。

小说《苦难鸳鸯》中的一些事件，也是我耳闻目睹或亲身经

历的。我在县政府知青办工作过，碰到过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爱上了了一个山区姑娘的美好故事，后来留在山乡工作，完全打破了婚姻上的门户偏见，这是小说中斯理良的原型。在“四清”运动中，我碰到了这样一件事，由于一个年轻的工作队员，不慎说出一名姑娘在读小学时被强奸的事，造成那位姑娘投河塘自尽的悲惨事件。我在下乡体验生活时知道这位姑娘，对她的死深感惋惜，我是怀着很痛惜的心情描写这个自杀细节的。但这使我想到了，我们不论做什么工作，都要耐心细致，十分周详，否则有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七十年代初起，我在一个领导八个工业局的办公室工作，领导我的一位党委领导同志是老复转军人。

这位老领导生活俭朴，起早摸黑地工作，下面的局厂，总是有不少油水，但他决不允许办公室里的干部有点滴谋私行为。他对我工作上信任、生活上关心，在当时那整天价批“臭老九”的岁月，就很令我诧异和奇怪。

之后，在长年累月的工作接触中，我知道了他的经历，他是河南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抗日战争期间，他和村里的十几个小伙子参加了拯救民族危亡的八路军。每一次上战场，子弹上膛，刺刀上枪，他都准备“把这一百多斤交给党了”。他立过大功，受过重伤，运好命大，侥幸活了下来。

他告诉我，那时在部队中，连小知识分子也很少，但他们写战报、发传单、刷标语、编快板、演短剧，紧急时也参加战斗。部队急行军战士们疲惫不堪时，他们领唱革命歌曲，硬是把战士们的战斗劲头鼓了起来投入战斗，令敌人闻风丧胆。他对我说，他说不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道理，但明白革命和建设需要知识分子，也希望知识分子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加强自身的思想修养。当年村里参加八路军的小伙子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大都牺牲了，只剩下他和另一位老同志还活着，自

已有什么理由，不为党和国家竭尽全力工作呢？有什么理由不爱护、关心国家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

这些话，饱含着这位老战士对人民的忠诚，也如此强烈地震撼着我的心，使我受到教育。数年后，我调离了那个地方，在向这位“老八路”告别时，眼眶中闪着泪花。这就是《山乡雨声声》中县委书记宗明诚的原型。

本书第二作者郑惠卿女士，对本小说集从题材、选材、主题的提炼，到小说的结构等都作了认真的研讨和分析，有的章节由她直接撰写，她的优美文笔使小说文采熠熠，产生一定的艺术效果，力求作品有更好的品格。

这个中篇小说集《一个记者的梦》出版时，正值我的母校上海市格致中学高耸、漂亮的新教学大楼落成启用之时，师生们和校友们正在欢愉地庆祝这所闻名遐迩的百年名校一百二十二周年校庆。格致中学的教学方针，是对学生们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学问学识上精心培育、严格要求，因而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人材。中科院和工程院有八位院士在格致中学就读，造就了一批学术造诣很深的专家教授。近十年来，学生们在国际级竞赛中得奖的达二百三十人次，在一九九四年上海市举行的七次国际、市级数学竞赛中，格致中学获得四项团体冠军，我不忘母校对我的厚爱和栽培，祝贺她更年轻、更昌盛，愿将这部拙著奉献给格致母校。

创作实践证明，一切文学作品都是客观生活的真实反映，生活是一切艺术永恒的源泉，在煤矿、钢铁厂、水泥厂、学校、机关、农村、山乡……，都使我感受到沸腾着的美好的生活。我充其量是一个文学爱好者，这里的小说无非是我走过的生活道路写真，和产生它的时代的情感、风尚的记录，我观察、比较、分析和研究生活和人事，再进入创作过程。我明白，这些作品谈不上好到哪里去，不过，文学创作总是像北宋文学家王安石所说的，“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我无才气，唯有以勤补拙，

奉上的这些文字，哪怕其中只有一、二篇能得到读者的青睐，也使我得到极大的快慰了。

王吉亮

1996年4月1日于暨南园

## 目 录

前言 .....	(1)
一个记者的梦 .....	(1)
山乡雨声声 .....	(58)
小鸟叫了 .....	(133)
春岭矿奇案 .....	(192)
苦难鸳鸯 .....	(247)

## 一个记者的梦

小院子里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人们都去搞革命大批判了。

一个蓬头垢面的年轻人，手里提着一条肮脏不堪的被子，垮在肩上的蓝色网线袋中，装着一只破损的搪瓷脸盆和几件旧衣服，步履蹒跚地走了进来，这个昔日热闹的绿色小院子，而今变得冷清而荒芜。

他苦笑了一下，走进了一幢旧宿舍，拾级而上到了五楼。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钥匙，在锁孔里旋转，但不行，开不了门。他看了看这把发锈的钥匙，凄然地摇了摇头。不管怎么说，使用这把钥匙意味着自由，意味着他至少可以暂时成为这间小屋的主人。至于往后的日子，只能是“到什么山砍什么柴，看什么日子往前挨”了。

他用力在破衣服上擦去铁锈，重新塞进锁孔，转着转着，似乎活动起来，“喀”的一声他猛力冲撞门，打了个趔趄，脚步踉跄地跌进房内。墙角的天花板上，布满了蜘蛛网，一只灰色的大蜘蛛，惊慌地躲向角落。

弹丸之地的小屋内，有一些破烂家具，一只木床，一把破藤椅和一张小写字桌，屋角的大书橱，是他参加工作后买的。他打

开书橱的拉门，里边除了一只布满灰尘的台历和一些旧报纸，已经荡然无存。聊以自慰的是，一纸箱心爱的书在被捕前“坚壁清野”了。台历的那一页是一九六九年八月五日，“这是我入狱的那一天，至今已整整五个年头了。”

囚徒的生涯结束了，世界观改造得如何可说不上，却学会了一手木工活，这可是谋生的伎俩。他感到疲乏，轻轻地打开窗户，房内显得明亮了些，新鲜空气流了进来，他用那堆旧报纸当枕头，一条破棉絮盖身，美美地睡着了。

隔天清晨，阳光洒进了玻璃窗，他醒了，双眼凝视着天花板，默默地思索着今后的生活道路该怎么走。理想、真理、爱情……，这些美好的东西，落花流水般地逝去了。前途渺茫，他现在需要的是图个温饱。其它，“让命运的波涛将自己送到未知的彼岸去，”他想。

正在胡思乱想，忽然听到“笃、笃、笃”的敲门声。奇怪，刚从囚笼中挣脱出来，有谁会来找他。

进门来的是一位年近三十的妇女，眉清目秀，衣着朴素大方，颇有几分动人的姿色，他迟疑了一下，惊喜地说：“云燕，是你！”

“是我，元政，你……”

女人还没说完，泪水簌簌地从双颊流下来，带着轻微的抽泣声。

“你看你，见面就哭了。唉，女人的感情就是脆弱。”耿元政看到她又要申辩了，抢先说：“秋瑾，刘胡兰，是不是？”

她笑了，他也笑了。以往，这对青梅竹马的同学之间，若要说到女性的性格懦弱时，她总要说到赵一曼、秋瑾等这些巾帼英雄。尽管她明白自己性格弱点，却不能同意别人瞧不起女性。

狱中的生活，他不愿多谈，她也不愿勾起那令人伤心的回忆，话题很快转到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上。

“我已经心如死灰，让命运来摆布吧。”

“你这不是颓废情绪吗？你不应该这样想！”

“即使我不这样想，现实也会教训我必须这样想的。在我们国家里，几千年的封建枷锁是不会从二十几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年代里消失的，弄得不好，可能会越演越烈。”

“可是，人总该有自己的理想。”

“太天真了！别的不说，光凭我现在刑满释放分子的身份，我会被一只只无形的、恐怖的网笼罩，会被一双双铁手钳住，我而今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干重活，吃苦饭。”

李云燕吃惊地望着他。她是一个有文化素养的女子，在一所大医院里做护士长，她懂得他所说的一切，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他对前途失去了勇气和信心，这对于一个深深地了解耿元政过去的人来说，无疑是太残酷了。

“你会说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狂热到灰心，”耿元政说：“谁喜欢怎样说都可以。好在这些年，我在牢中学会了木工活，我决定到农村中去替农民盖房修农具，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混口饭吃。”

“你放弃你的新闻工作了？”

“有一句挖苦话说，‘若要害朋友，叫他去办报’，这是个危险的工作，至少现在是这样。‘事实要为政治服务’，这种论调何等荒唐，我又不愿用我的笔去欺骗老百姓，再说，老百姓也不那么容易受骗了。”

“元政，你以前是那么有理想啊，你时常说，列宁说过：‘记者的职业是战士的职业，新闻记者是党的文学家’，你说过，你将来要当一名优秀的记者。”

“那是一个未谙世事年轻大学生的简单头脑，我的云燕同志！”耿元政越说越激动，“理想？只能说是空想。一碰到现实，就被碰得粉碎。我不读那么多书，会过得愉快些，更不会有牢狱之灾，‘人生识字糊涂始’哩！”

愤激地说了这一番话后，他又仔细地端详了她。她还是那样年轻美貌，那样温柔多情，那对水汪汪、玻璃般的大眼睛中，透出了她纯洁的心灵。唉，这么好的姑娘，命运的恶作剧，竟不能成为自己的妻子，真是伤疼不已！……

他俩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同校同学，元政比云燕高三个年级，情投意合，两小无猜。云燕的父亲看得中这个聪明好学，诚实质朴的孩子，希望他俩能结秦晋之好。可惜，生活的逻辑总不能尽如人意。

“可是，元政，”李云燕安慰他说：“牢骚太盛防肠断，船到桥头自会直，我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海州日报仍然要你去当记者。”

“饶了我吧！”耿元政愤愤地说：“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会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中去当什么记者，本人不敢高就！”说到这里，他忽然想起来，说：

“咦，怪了，你怎么知道我昨天刑满释放？你怎么知道我恢复原职？说不定你是一个有来头的人。”

“一个小人物，打针送药的护士，有什么来头。”

“那不一定，江青原是三等戏子，现在却是叱咤风云的‘文革旗手’！”

“嘘……”李云燕惊慌地说：“你啊，像水晶一般透明，吃亏就在嘴巴，人家官大权大，惹得起吗？”

“好好，我牢记‘祸从口出’这句话，多磕头，少说话，这总行了吧？不过，你有来头，我看得出来。”

李云燕不知所对，心情苦楚，用牙咬了咬嘴唇，心情复杂难言，嗫嚅着说：“我……结婚了。”

耿元政，这个刚强的汉子，眼眶里闪着泪花，问：“和谁结婚？”

“戴——文彦……”

“哦——”

一声长叹，耿元政全明白了。戴文彦是他中学时的同班同学，交情也较好。一九五四年春他们是一同入的团。他认为戴文彦不能说是一个品质不好的人，也许政治斗争使他变得性格复杂，而且越来越复杂。他的做人诀窍，就是要适应变幻莫测的社会。任何时候，挨打的总是多嘴的婆姨离群的羊。

中学毕业后，戴文彦考进了建工学院，毕业后在市工交系统的几个单位工作过，后来到水泥厂当了技术科副科长。耿元政和这位老同学之间，进行过不止一次有关人生哲理探讨：一方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要“做时代的主人”；一方认为人生在世还是要“识事务者为俊杰”。见解上的分歧，使两人在思想上格格不入，后来他们又各自入了党。但耿元政觉得，戴文彦这个人，与其说是一个共产党员，还不如说是一个笃信“顺乎天命、无为而治”的道学家。

看到耿元政缄默不语，更勾起了李云燕伤心的回忆，她说：

“元政，你太固执！当年爸爸从赞成到最后反对我俩之间的事情，就因为这一点。他非常怕你因此闯祸，而你果然闯了祸。你刚才说了那么多牢骚话，这是一种感情发泄，你这样的人，不会轻易改变自己，这我知道。”

李云燕的父亲是本市一家出版社的老编辑，一个兢兢业业、谨小慎微的知识分子。饱尝了人间风霜，使他敏感政治风浪的危险。说实在的，由于是近在咫尺的邻里，他看着耿元政从小长大，喜欢这个秉性刚直的孩子，觉得大丈夫应该立于天地之间，看到他和女儿间的情投意合，也是赞许的。随着岁月流逝，他看到这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凡事都有独立见解，也必然在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上，产生与社会思潮不相容的东西。

老编辑复杂的性格是奇怪的混合物，他既感到自己逆来顺受性格的缺陷，把革命工作当作谋生的手段，又对小耿不阿谀奉承、

富有思考力而忐忑不安，他不禁为女儿担忧起来，渐渐地不赞同他俩的恋爱关系了。以后事情的发展，似乎证明老编辑有远见卓识。

耿元政正在追问消息的来源，忽然邮递员送来一封信，启封一读，行文简短：

“耿元政同志：接信后，请即来报社一谈。

海州日报组织部

1974年9月11日

“怎么样，我没有骗你吧？”

“最好你是在骗我。”

“这么说，你确实不想从事记者这个高尚的职业了？”

耿元政苦笑了一下，坚定地摇了摇头。

几天过去了，他没有去报社谈话。然而，在接二连三接到副总编辑赵昆林的电话、来信后，真乃师命难违，却之不恭了。他不愿太伤老师的心，反正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话总得说清楚，终于无可奈何来到报社。

赵副总编辑为什么要硬着头皮、担着风险，一定要耿元政回报社？原来，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赵昆林和元政的父亲在一个连队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不幸，耿排长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光荣牺牲。解放战争期间，他被调到前线去当战地记者，成了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

五十年代初，海州大学成立新闻系，党派这位有多年新闻工作经验的老同志担任系主任。真是无巧不成书，在五五届的新生中，他发现一位叫耿元政的烈士子弟，待他知道，这青年竟是自己出生入死的战友的儿子时，他自然而然地对这一个学生付出了前辈和师长的双重感情。

五年大学新闻系的学习中，赵主任看出这个孩子具有作一个新闻记者的难能可贵的品质，赵昆林喜欢上了这个年轻人。后来，

他作为《海州日报》领导人又是耿元政的上级，在记者工作中，他多次为这个不怕虎的牛犊，化险为夷，使之遇难呈祥。

真是一山过了一山拦。五年前，在那件闹得满城风雨的金江县“反大寨事件”中，赵昆林双手难挡险风恶雨，眼看心爱的学生锒铛入狱。这一年来，临近刑满，他为学生恢复工作到处奔波、游说、辩解、求情，终于有了佳音。至于这个犟脾气的年轻人是怎么想的，要谈了话才知道。

“终于把你请来了，很好！”赵昆林握着学生的手，高兴地说：“你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哪，你这尊菩萨真难得。”

“老师，我知道你在打我的主意。”

“何以见得？”

“李云燕告诉我的。”

“这个小丫头！”赵昆林打趣着说：“她的丈夫戴文彦，和市委副书记虞伟夫很熟，你的案子闹得常委们都知道。你地位不高，名气不小。不过，现在连中央的秘密都有人捅出来，你的消息，就不足为怪了。”

“这倒也好，打开天窗说亮话，老师，你为什么对我念念不忘？”

“什么意思？”

“你应该‘念念不忘’的是阶级斗争，而不是我耿某人。至于工作问题，老师，你不要为我操心了。”

“怎么，你不想干新闻工作了？”

“彻底领教，敬而远之！”耿元政愤愤地说：“我在大学时学的一套新闻理论和采访写作，对不起，全都用不上。”

“怎么会用不上呢？难道你把我这个新闻系教授，当作江湖骗子了吗？”

“现在只有需要，而没有真理。你上课时说，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有了事实才有新闻，可是，而今报纸上有的文

章可以谎话连篇，信口雌黄，依我看，如果不是公款订报，报纸没人看，一份卖不出！”

赵昆林默默无言地在办公室里踱步。凭良心说，他的学生说的并非全无道理，不过，作为报社领导，作为师长，他不能不规劝几句。

“我理解你的心情，你有冤案，难免怒火中烧。但也有人认为你‘反大寨’有罪。认识上天壤之别，难有共识。依我看，人总要讲究现实为好。我的苦心，你也该明白，你回报社工作，阻力很大……”

他看到耿元政张嘴要说，便阻止他：“你听我说！——宣传部雷部长和我多年共事，总不能不尊重我的意见吧。我不愿看到你毁下去，从各方面条件看，报社内很少有人及得上你，叫你回来，也是出于工作上的考虑。”

“嘿，老师，张春桥不是说过，只要小学毕业，就能当记者吗？”

“不说这些，不说这些，”赵副总编皱着眉头说：“小心犯了禁条，他说他的‘金玉良言’，我还要天天出报。我这个当领导的，很多事想不通，在平衡木上跳舞，弄不好就得下来。”

说到这里，赵昆林心里很不痛快，他呷了一口茶，又说：“反正报纸嘛，阶级斗争的工具嘛，其实你我都是工具，桌子是工具，钢笔是工具，工具的使命是被人随意使用。”

“这不对，桌子没有思想，钢笔没有思想，你我血肉之躯，也没有思想吗？”

赵副总编顿时语塞，他察觉到自己说漏了嘴，他对这个学生，爱的是这一点，不爱的也是这一点。小伙子吃了苦头，到头来还是如此这般，岂不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的最好印证吗？

正在这思想交锋时刻，樊景之进来了。看到这刀光剑影的争论，便问：“老赵，你又在发表什么长篇大论啊？”

赵昆林说：“我是在说工具的使命。”